
马克思主义财政扶贫理论与政策： 十九大精神下的探索

王艺明 胡久凯*

内容提要 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并明确指出新时代下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从现在到2020年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论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模型,研究发现,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但不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率,还会促进整体消费增长率的最大化,缩小地区间差距。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进行了经验评估,发现中国对贫困县的财政扶贫政策绩效是比较显著的。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扶贫政策 财政支出绩效 马克思主义 劳动价值论

一 绪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回顾过去5年的工作时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

* 王艺明: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 361005 电子信箱:wym@xmu.edu.cn;胡久凯(通讯作者):湖北经济学院 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8号 430205 电子信箱:jiukai89@163.com。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1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ZD018)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

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0%以下。中国共产党创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的成就,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十九大报告还提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新的征程令世界期待,中国的成果经验不仅印证自身选择的正确性,而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从历史到现在,贫困问题始终是一个困扰全世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截至2016年全球仍有极端贫困人口8亿多^①。贫困问题是造成当今世界各国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西方学者们从社会、经济、政治、人口等不同角度开展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受限于各自的研究立场,其研究过程往往面临着无形的思想桎梏。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只要财富和收入的获得满足程序公正原则(初始获得的公正和财产转移的公正),那么由此而带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不管差距有多大(杨春学和张琦,2014),从这个出发点要解决贫困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研究贫困问题的最有力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出版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仍然放射出真理的光芒。国内现有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献很少涉及贫困问题。中国政府扶贫政策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能有力指导中国脱贫攻坚的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将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本文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平衡布局的理论构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的成因和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模型,研究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缺乏基于生产力平衡布局的政府干预,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资料存量、劳动生产率差距会越来越大,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而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但不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率,还会促进整体消费增长率的最大化,缩小地区间差距。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还对中国的财政扶贫政策绩效进行了经验评估,经验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以1994年“八

^① 数据来自联合国2016年7月发布的《发展与全球化:事实与数据》年度报告。

七扶贫计划”中“四进七出”的贫困县划分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来构建断点回归,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评估财政扶贫支出对贫困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本文是在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条件下,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一个有益探索。本文对财政扶贫支出绩效的评估,是对现有文献关于中国政府扶贫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研究的有益补充,对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以及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区域公平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 文献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与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从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失业人口膨胀、生产相对过剩到经济危机的有机链条,从而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规律。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根本区别,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制也有根本区别,因此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但可以也应该应用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进行了一些研究,多数围绕贫困理论本身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如李晓红和周文(2009)、王峰明(2016)等。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的一篇重要文献是刘建华和丁重扬(2012)的研究,他们指出社会主义贫困的一般原因在于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制度原因在于私有经济较大规模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对策。刘建华和丁重扬(2012)对中国现阶段贫困问题成因和对策的研究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的研究未涉及具体扶贫政策。陈振明和吕志奎(2017)介绍了习近平同志著作《摆脱贫困》中对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的理论思考与经验总结。

马克思主义关于贫困问题的另一个理论是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形式就是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无处不在的,除了工人和资本家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外,还有各地区、各产业、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还有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等,这些不平衡必然造成某些地区、某些人口甚至大部分人口的贫困。他们对未来的构想是,要逐步消除区域差异,社会主义国家应有计划地实现生产力均衡配置。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

条件。”^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就是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合理的生产力分布格局,充分利用各个地区的资源优势,逐步缩小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为社会主义最终消灭贫困指明了方向。

本文旨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平衡布局的理论构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的成因和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对财政扶贫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估,以期得到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

(二)中国政府扶贫绩效的衡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国家扶贫战略,对这些扶贫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现有相关文献结论对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绩效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部分研究认为财政扶贫绩效较低,Guo等(2016)认为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引致地方财政支出增加,进而引致经济总量增长,把经济总量增长与财政支出增加相比,即可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乘数约为0.6。虽然这篇论文估计的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乘数,但其识别策略是以央地转移支付引致的财政支出增加来估计财政乘数。研究结果显示,1元的财政支出增加仅带来了0.6元的GDP增长,这说明中国对贫困县的财政扶贫绩效较低。刘畅和马光荣(2015)应用断点回归方法估计了1999-2009年中国县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发现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更多地刺激了贫困县的财政支出而不是经济增长,会使地方财政支出增长快于地方GDP的增长速度。

但也有不少文献认为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绩效是比较明显的。李燕凌和欧阳万福(2011)研究了湖南省县、乡政府2004-2006年的财政支农支出效率,发现农田基本建设投资产生了较强的引致效应,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总产值等的综合生产效率较为理想。毛捷等(2012)发现“八七扶贫计划”期间,贫困县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和公共服务,而非行政消费。Meng(2013)发现同期中央对贫困县的扶贫资金是每人每年95.7元(1994年不变价),而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8%,也就是平均每人每年增长40.6元,因此整体来看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是比较好的。张彬斌(2013)研究了21世纪初的第3轮大规模农村扶贫的产出效果,发现新时期扶贫政策对国家级贫困县农民具有增收效应,并且对农林牧渔业、普通中学教育、医疗卫生条件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王艺明和刘志红(2016)考察了“八七扶贫计划”对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47页。

贵州、甘肃、内蒙古及河北四省区各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政策效应,发现各省区总体实施绩效均比较显著。

上述文献多数采用 OLS 或其他回归方法估计扶贫政策绩效或财政支出乘数,因此面临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内生性,财政支出增加和经济增长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参数估计有偏;二是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非常多,在进行回归时很难全部列入。Guo 等(2016)在回归中采用了工具变量以避免内生性问题,但又面临着合适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同时仍然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的可能。毛捷等(2012)、Meng(2013)、刘畅和马光荣(2015)采用了断点回归方法,以 1994 年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划分这一制度断点来衡量贫困县政策的经济绩效,但他们的研究主要不是围绕财政扶贫支出绩效的衡量。综合来看,断点回归应是估计中国财政扶贫绩效的合理方法,特别是在 1994 年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划分这一制度断点存在的情况下。本文经验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以 1994 年“八七扶贫计划”中“四进七出”的国家级贫困县划分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来构建断点回归模型,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评估财政扶贫支出对贫困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

三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中央-地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模型

中国的财政扶贫政策框架包括区域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性开发政策、公共服务政策和扶贫开发专项扶持等,其作用机制和政策效应与中国整个财税体制密切相关。中国老一辈财政学者如许毅、邓子基、陈共和叶振鹏等很早就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分配论”、“再生产前提论”和“二元结构财政论”等理论。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理论等都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到目前为止,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还很少涉及财税政策。要量化地分析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应,有必要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构建一个财税政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于分析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以及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和产出等的影响,这也是本部分的研究目的。应用该模型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的成因,以及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模型设定与求解

我们假设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和两个地区性政府,用 $i = 1, 2$ 分别表示这两个地区,其中地区 1 是经济发达地区,地区 2 是贫困地区。在每一期两类经

济主体都各拥有 L 单位劳动时间,中央政府分别对每个地区的经济主体课征 τ 比例的所得作为财政收入,并在下一期以生产性公共投资的方式支出。由于我们重点分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转移支付,因此假设不存在其他地方政府税收以简化分析。

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过程,而价值增殖过程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正是在严格区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基础上,马克思科学阐明了价值与剩余价值的创造源泉,从根本上揭示了劳动价值论和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区别(刘树成和周思毅,1985)。因此,我们在描述两个地区的商品生产过程时必须区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 两个地区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过程。假设在经济体系中只存在一种最终产品,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生产出该最终产品,而该最终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载体,既可用于经济主体的消费,又可作为生产资料再投入生产。最终产品的实际例子有农产品、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和房地产等,用于生产经营即为生产资料,用于生活即为消费资料。从理论抽象角度,可以把最终产品视为一篮子产品和服务,当用于生产或消费时需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Foley 和 Michl(1999)、骆桢(2016)、王艺明(2017)等采取了类似的假设。

劳动过程是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表现为生产劳动”,它“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而生产资料“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它们“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①,因此,它们是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中国很多学者很早就指出(刘树成和周思毅,1985),可以用生产函数来反映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过程,即一定条件下(如平均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产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假设 i 地区的经济主体在 t 期的生产函数为:

$$Y_{it} = \min(e_{it}L, \rho_{it}K_{it}) \quad (1)$$

其中, Y_{it} 是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数量,为劳动时间, K_{it} 是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 e_{it} 和 ρ_{it} 是生产技术条件参数。(1)式中的生产函数是固定投入比例的里昂锡夫生产函数,即 $\frac{1}{e_{it}}$ 单位的劳动和 $\frac{1}{\rho_{it}}$ 单位的生产资料结

^① 马克思(1975,中译本):《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6、214、239、581页。

合可以生产出 1 单位最终产品。(1)式是数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生产函数形式。

Foley 和 Michl (1999)、骆桢 (2016) 指出, (1) 式的设定意味着资本技术构成为 $\frac{e_{ii}}{\rho_{ii}}$, 劳动生产率为 e_{ii} 。在劳动过程中, 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生产出最终产品的物质形态, 但生产资料并不是全部损耗掉的, 如机器设备在生产中会折旧, 但下一期仍可继续使用, 而原材料被全部消耗掉, 可以假设 i 地区在 t 期生产中生产资料的平均消耗率是 δ_{ii} , $0 \leq \delta_{ii} \leq 1$ 。在上述设定下, i 地区经济主体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 Y_{ii} , 扣除生产资料消耗部分 $\delta_{ii}K_{ii}$, 剩下的部分 $(Y_{ii} - \delta_{ii}K_{ii})$ 包括缴纳给中央政府的税收 $\tau(Y_{ii} - \delta_{ii}K_{ii})$ 以及分配给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税后实物所得。由于本文分析的重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 不考虑一个地区内部的分配问题, 因此假设分配给劳动者的实物工资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剩余产品均为该地区经济主体所有。

2. 两个地区最终产品生产的价值增值过程。价值增值过程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 是价值源泉”, 而且是唯一的源泉; 生产资料“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 价值增值过程可以表述为: 商品价值 =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 其中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等于活劳动消耗。但注意到两个地区产量、生产资料存量和生产技术条件各不相同, 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不同会导致两个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不同。马克思指出, 劳动生产率高的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少, 其个别价值就低于社会价值; 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者耗费的劳动时间多, 其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商品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出售的。这样, 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商品生产者, 就能获得超额利润; 相反就无利可图。根据马克思的上述理论, 我们可以计算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

假设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为 $\Lambda_{i,t}$, 而该最终产品在 t 期的社会价值为 Λ_t , 则有:

$$\underbrace{\Lambda_{ii} Y_{ii}}_{\text{商品价值}} = \underbrace{\Lambda_t \delta_{ii} K_{ii}}_{\text{不变资本}} + \underbrace{L}_{\text{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quad (2)$$

上式说明, i 地区在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总量 $\Lambda_{ii} Y_{ii}$ (即马克思价值分

① 马克思 (1975, 中译本):《资本论》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第 220、228 页。

解方程中的商品价值),等于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 $\Lambda_i \delta_{ii} K_{ii}$,即不变资本,加上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 L ,即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 i 地区经济主体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由社会必要时间决定,其价值为社会价值 Λ_i ,但应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最终产品时实际消耗的劳动时间又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 Λ_{ii} 。由(2)式可解得 $\Lambda_{ii} = (\Lambda_i \delta_{ii} K_{ii} + L) / Y_{ii}$ 。如果(1)式中生产资料和劳动是按比例投入的,即不存在生产资料或劳动投入冗余,有 $Y_{ii} = e_{ii} L = \rho_{ii} K_{ii}$,此时 i 地区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为:

$$\Lambda_{ii} = \Lambda_i \delta_{ii} / \rho_{ii} + 1 / e_{ii} \quad (3)$$

(3)式说明, i 地区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由其劳动生产率 e_{ii} 以及生产中生产资料消耗的比例 $\frac{\delta_{ii}}{\rho_{ii}}$ 决定,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资料消耗比例越低则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越低。注意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比贫困地区高,因此其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较低。如果两个地区生产资料和劳动是按比例投入的,即不存在生产资料或劳动投入冗余,有 $Y_{ii} = e_{ii} L = \rho_{ii} K_{ii}$,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 $\Lambda_t = \sum_{i=1}^2 (\Lambda_i \delta_{ii} / \rho_{ii} + 1 / e_{ii}) Y_{ii} / \sum_{i=1}^2 Y_{ii}$,可解得:

$$\Lambda_t = 2 / \sum_{i=1}^2 (1 - \delta_{ii} / \rho_{ii}) e_{ii} \quad (4)$$

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有 $e_{1t} > e_{2t}$,容易证明 $\Lambda_{1t} < \Lambda_t < \Lambda_{2t}$ 。即经济发达地区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贫困地区生产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如果生产和再生产单位劳动力需要的消费资料数量为 b 单位最终产品,则(2)式中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可分解为劳动力价值 $\Lambda_{ii} bL$ 和剩余价值 $(1 - \Lambda_{ii} b)L$ 两部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润率为 $\pi_{ii} = (1 - \Lambda_{ii} b)L / (\Lambda_i \delta_{ii} K_{ii} + \Lambda_{ii} bL)$,容易证明 $\pi_{1t} > \pi_{2t}$,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利润率要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生产经营的利润率较低,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进而造成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另外,由(4)式可知,任一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e_{ii} 提高,最终产品的社会价值都会降低;任意一个地区生产中生产资料损耗的比例 δ_{ii} / ρ_{ii} 降低,最终产品的社会价值都会降低。

3. 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力平衡分布的观点出发,一方面应实现生产力在区域间的平衡分布,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各个地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区域公平的目标就是在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逐渐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恩格斯指出,“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

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为实现生产力的区域平衡分布,应按照统一计划公平地在各地区之间分配生产力。向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就是通过向该地区追加生产资料,以实现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在本文模型中, t 期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为 $\tau \sum_{i=1}^2 (Y_{it} - \delta_{it}K_{it})$ 单位最终产品。中央政府会在两个地区之间进行配置,假设中央政府在 t 期将财政收入中的 x_{it} ($0 \leq x_{it} \leq 1$, $\sum_{i=1}^2 x_{it} = 1$)部分,即 $\tau x_{it} \sum_{i=1}^2 (Y_{it} - \delta_{it}K_{it})$ 单位最终产品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给地区 i ,且所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均作为两个地区下一期的生产资料,也即所有财政支出均为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属于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六项扣除中的积累基金。

4. 两地区的扩大再生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前文指出,本文研究重点是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不考虑地区内部的分配,因此假设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均为该地区经济主体所有。在本文模型中只假设了一种最终产品,基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可以假设经济主体生产获得的最终产品,扣除生产资料消耗部分和中央政府税收后,剩下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生产的最终产品量 Y_{it} ,扣除生产资料损耗部分 $\delta_{it}K_{it}$,扣除缴纳给中央政府的税收 $\tau(Y_{it} - \delta_{it}K_{it})$,其所得为 $(1 - \tau)(Y_{it} - \delta_{it}K_{it})$,他会将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消费,剩下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假设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将税后所得用于消费的比例为 c_{it} , $0 \leq c_{it} \leq 1$,即将 $(1 - \tau)c_{it}(Y_{it} - \delta_{it}K_{it})$ 单位最终产品用于消费,将 $(1 - \tau)(1 - c_{it})(Y_{it} - \delta_{it}K_{it})$ 单位最终产品作为积累以扩大下一期的生产资料规模。在 $t + 1$ 期 i 地区经济主体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数量为:

$$K_{i,t+1} = K_{it} - \delta_{it}K_{it} + (1 - \tau)(1 - c_{it})(Y_{it} - \delta_{it}K_{it}) + \tau x_{it} \sum_{j=1}^2 (Y_{jt} - \delta_{jt}K_{jt}) \quad (5)$$

(5)式意味着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 1$ 期投入生产的生产资料数量为 t 期生产资料数量 K_{it} 减去 t 期生产中损耗的 $\delta_{it}K_{it}$ 部分,加上经济主体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 $(1 - \tau)(1 - c_{it})(Y_{it} - \delta_{it}K_{it})$,加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tau x_{it} \sum_{j=1}^2 (Y_{jt} - \delta_{jt}K_{jt})$ 。在多阶段的经济环境设定下,我们还需要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生产技术参数 e_{it} 和 ρ_{it} 在各期的变动进行设定。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25页。

关于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①,“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②,因此生产资料规模越大的地区劳动生产率越高,可以合理地假设劳动生产率 e_{it} 和该地区生产资料数量成正比,即有 $e_{it} = \gamma K_{it}$, $\gamma > 0$ 。对于其他生产技术参数 ρ_{it} 和 δ_{it} , 由于没有明确的变动方向,为集中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引致的生产资料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变动带来的影响效应,可以假设这些参数在各地区和各期保持不变,即 $\rho_{it} = \rho$, $\delta_{it} = \delta$ 。在上述设定下,(1)式中生产函数可以写成:

$$Y_{it} = \theta K_{it} \quad (6)$$

其中, $\theta = \min(\gamma L, \rho)$ 是一个正的常数。(6)式说明各地区在各期的最终产品产量是和生产资料数量同比增长的。上述设定极大地简化了本文的模型,但不会失去本文模型的主要特征,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的主要观点。从地区间的比较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存量较大,其劳动生产率高于贫困地区,有 $e_{1t} = \gamma K_{1t} > \gamma K_{2t} = e_{2t}$; 其资本技术构成高于贫困地区,有 $e_{1t}/\rho > e_{2t}/\rho$; 其产出高于贫困地区,有 $Y_{1t} = \theta K_{1t} > \theta K_{2t} = Y_{2t}$; 其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小于贫困地区,有 $\Lambda_{1t} = \Lambda_t \delta / \rho + 1/e_{1t} < \Lambda_t \delta / \rho + 1/e_{2t} = \Lambda_{2t}$ 。从时间角度看,随着资本存量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两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e_{it} = \gamma K_{it}$ 不断提高,资本技术构成 e_{it}/ρ 不断提高,产出 $Y_{it} = \theta K_{it}$ 不断提高,产品价值 $\Lambda_t = \sum_{i=1}^2 1/(1 - \delta/\rho) / \sum_{i=1}^2 e_{it}$ 不断减少。因此上述假设在简化模型的同时,把握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另外,前文分析指出,如果 δ_{it}/ρ_{it} 降低,即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消耗的比例降低,则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会降低。在 $\rho_{it} = \rho$, $\delta_{it} = \delta$ 的假设下,该性质仍然成立。

5. 两地区经济主体的决策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前文分析指出, i 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将 $(1 - \tau)c_{it}(Y_{it} - \delta K_{it})$ 单位最终产品用于消费,代入(6)式,可写成 $(1 - \tau)c_{it}(\theta - \delta)K_{it}$ 。而其生产资料增长决定了产出和消费的增加,可以将(5)式写成:

$$K_{i,t+1} = K_{it} - \delta K_{it} + (1 - \tau)(1 - c_{it})(\theta - \delta)K_{it} + \tau x_{it}(\theta - \delta) \sum_{j=1}^2 K_{jt} \quad (7)$$

分析需求应当从全社会或各阶层(阶级)需求着眼,而且需求应该是有支付能力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2001,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22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52-358页。

的需求(晏智杰,1982)。考虑两个地区经济主体的社会需求,借鉴 Foley 与 Michl (1999)、李海明(2014)等的研究,假设两个地区经济主体的消费能满足其社会需求,其消费-积累决策是在(7)式的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终生消费资料数量。

$$\max_{c_{i0}, c_{i1}, \dots} \sum_{t=0}^{\infty} \beta \ln(1 - \tau) c_{it} (\theta - \delta) K_{it} \quad (8)$$

其中, $0 < \beta < 1$ 是经济主体的时间偏好率。同样地,假设两类经济主体的时间偏好相等以集中研究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效应。求解 i 地区经济主体的消费-积累决策问题,可解得其一阶条件应满足:

$$c_{it} K_{it} / c_{i,t-1} K_{i,t-1} = \beta [\tau(\theta - \delta) x_{it} + (1 - \delta) + (\theta - \delta)(1 - \tau)] \quad (9)$$

由(9)式可知, i 地区在 t 期消费的最终产品量与 $t - 1$ 期的消费量之比,即 $c_{it} K_{it} / (c_{i,t-1} K_{i,t-1})$, 与中央政府的税率 τ 及对该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 x_{it} 相关。可以得到,在给定税率 τ 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比例 x_{it} 较高的地区,该地区经济主体对最终产品消费量的增长率也较高。

在本文框架下,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财政扶贫政策会促进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居民消费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假设税率 τ 相对稳定、无法逐期调整,但在每一期,中央政府都调整两个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以实现下面两方面政策目标:(1)使整体经济的总消费增长率最大化;(2)使整体经济的总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上述两方面政策目标都是以两个地区的生产资料动态变化即(7)式以及两个地区经济主体的一阶条件即(9)式为约束条件。我们分别考虑中央政府如何实施财政转移支付以实现上述两目标。

首先考虑第一方面政策目标。两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的总消费增长率为:

$$\begin{aligned} \Pi &= (c_{1t} K_{1t} + c_{2t} K_{2t}) / (c_{1,t-1} K_{1,t-1} + c_{2,t-1} K_{2,t-1}) \\ &= \left(\frac{c_{1t} K_{1t}}{c_{1,t-1} K_{1,t-1}} + \frac{c_{2t} K_{2t}}{c_{2,t-1} K_{2,t-1}} \frac{c_{2,t-1} K_{2,t-1}}{c_{1,t-1} K_{1,t-1}} \right) / \left(1 + \frac{c_{2,t-1} K_{2,t-1}}{c_{1,t-1} K_{1,t-1}} \right) \end{aligned} \quad (10)$$

中央在进行 t 期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的决策时, $t - 1$ 期两地区之间的消费比率 $c_{2,t-1} K_{2,t-1} / c_{1,t-1} K_{1,t-1}$ 是既定的,把(9)式代入并对 x_{it} 求偏导可解得:

$$\partial \Pi / \partial x_{it} = \beta \tau (\theta - \delta) (1 - c_{2,t-1} K_{2,t-1} / c_{1,t-1} K_{1,t-1}) / (1 + c_{2,t-1} K_{2,t-1} / c_{1,t-1} K_{1,t-1}) \quad (11)$$

注意到地区 1 是经济发达地区,地区 2 是贫困地区,因此有 $c_{2,t-1} K_{2,t-1} / c_{1,t-1} K_{1,t-1} < 1$, 从而(11)式中 $\partial \Pi / \partial x_{it} > 0$ 成立。(11)式意味着,要实现第一方面政策目标,即两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的总消费增长率最大化,中央政府应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直至两地区的消费相等。当两地区消费相等即 $c_{2,t-1} K_{2,t-1} / c_{1,t-1} K_{1,t-1} = 1$ 时,有 $\partial \Pi / \partial x_{it} = 0$, 此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对两地区的消费总增长率没有影响。

接着考虑第二方面政策目标。结合(6)和(7)式,两地区经济主体在 t 期的总经济增长率为:

$$\begin{aligned} \Psi &= (K_{1t} + K_{2t}) / (K_{1,t-1} + K_{2,t-1}) \\ &= 1 + \theta - 2\delta - (1 - \tau)(\theta - \delta)(c_{1,t-1}K_{1,t-1} + c_{2,t-1}K_{2,t-1}) / (K_{1,t-1} + K_{2,t-1}) \quad (12) \end{aligned}$$

注意到 $(1 - \tau)(\theta - \delta)(c_{1,t-1}K_{1,t-1} + c_{2,t-1}K_{2,t-1}) / (K_{1,t-1} + K_{2,t-1})$ 等于 $t - 1$ 期两地区经济主体的总消费率乘以 $\theta - \delta$,中央政府在进行 t 期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的决策时该比率值是既定的,即 $\partial\Psi/\partial x_{1t} = 0$,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不会影响两个地区的总经济增长率或总产出增长率。

恩格斯指出,“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①本文模型从财政转移支付角度分析生产力配置的政策效应,通过对两方面政策目标的分析发现,中央政府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不但不会影响两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率,而且还将有助于实现整体经济的总消费增长率最大化,缩小地区之间在生产资料数量、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

(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的成因与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

上述模型研究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基于生产力平衡布局的政府干预,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资料数量、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主体的收入和消费差距会越来越大,但其形成机制与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生产资料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差异,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差距。上述模型没有考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首先,如果生产资料可以跨地区流动,那么生产资料会从贫困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着资本不断从贫困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的现象。其次,如果劳动力可以跨地区流动,那么会从贫困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劳动者的产出和收入都较高。因此,如果考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地区间的收入和贫富差距会更大。我们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实施倾向于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非但不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率,而且会促进整体消费增长率的最大化,并且缩小地区间差距,可以避免不同地区出现相同劳动创造不同价值、获得不同报酬的现象。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46页。

结合上述模型,可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产生的原因和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

首先,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从一般层面上讲,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确实有一部分地区经济先发展起来、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在一些农村和城市地区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问题。如果相对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贫困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仍然持续落后甚至更加贫困,那么这样的区域发展模式就是不公平的,也是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应当影响区域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不应当形成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从长期来看,这种差距应当逐渐缩小以实现区域间的相对公平。我们发现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的生产力区域布局策略有助于实现全国一盘棋统一规划与地方自主调节之间的平衡。中国财政扶贫政策一贯重视贫困地区生产资料的构建和生产力的提高,通过开发式扶贫、产业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增长,增强贫困地区综合实力。一方面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解决交通、电力、饮水和信息等直接影响农村发展、农业增收、农民致富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瞄准贫困县、乡镇、村和农户,利用财政资金、小额信贷、以工代赈等方式结合项目与当地优势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帮助贫困人口形成生产性资本、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在中国目前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如果政府不积极发挥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功能,贫富两极分化就可能会成为现实。因此,财政扶贫政策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保障力度;另一方面应提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技能,包括大力发展职业培训,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卫生等人才培养的补助,帮助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等。这些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复杂度,从而提高其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增加其劳动收入。

综上所述,以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为指导的财政扶贫政策应着眼于提高贫困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其产出、劳动收入和消费,增加贫困地区人民拥有的财富,缩小和经济发达地区在收入和财富等方面的差距。因此,如果要衡量财政扶贫绩效,应重点考察财政扶贫支出是否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这也符合中国财政扶贫的政策设计初衷。如果财政扶贫政策无法在更大程度上提高贫困地区的

劳动生产率,那么它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本文采用的断点回归法可以较好地检验上述理论推论。

四 经验研究设计

如前文所述,我们需要检验财政扶贫政策是否使得贫困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更快增长。在研究设计上,本文利用“八七扶贫计划”所提供的断点,以非贫困地区作为对照组,可以较好地识别出财政扶贫支出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劳动生产率通常用劳动者在单位时间所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计算,而实际 GDP 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一年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总额,可以衡量两个不同时期经济中的产品产量变化,因此可以用一个地区的实际 GDP 除以投入的活劳动总量(如就业总人数)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表变量。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县级数据中很多未统计就业总人数,因此在研究中我们以人均实际 GDP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表变量。研究中我们估计出 1 个百分点的扶贫支出增长会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个百分点,这实际上衡量了财政扶贫支出的产出弹性。

在经验研究部分,本文以 1994 年“八七扶贫计划”中“四进七出”的国家级贫困县划分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来构建断点回归设计,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评估财政扶贫支出对贫困县劳动生产率和人均 GDP 增长的影响效应。作为对比,我们也采用传统的 OLS 回归方法对地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估,尽管这种估计方法存在内生性,会导致估计系数有偏和不一致。本文的 OLS 和断点回归模型参考了 Hall(2009)、Barro 和 Redlick(2011)、Guo 等(2016)的文献。

(一) OLS 回归模型的设定

财政支出绩效评估的 OLS 回归模型构建如下:

$$\bar{Y}_j = \beta_0 + \beta_1 \bar{G}_j + X_j \Gamma + \varepsilon_j \quad (13)$$

被解释变量 \bar{Y}_j 为各个县人均 GDP 在样本期内的年均增长率,核心解释变量 \bar{G}_j 为各个县人均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率。 X_j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在 $t=1$ 时(2000 年)的期初值。系数 β_1 表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增加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 增加多少个百分点,我们用它来评估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前文已指出,采用 OLS 估计方法存在内生性问题,但作为比较本文仍报告 OLS 估计结果。

要正确地估计财政扶贫政策绩效,就必须识别出扶贫政策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及

其带来的 GDP 增长。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进行分析,主要是设计一个策略将财政支出变动对 GDP 的影响与其他相关经济特征分离,具体介绍如下。

(二) 断点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第一阶段回归即断点回归的模型设定如下:

$$\bar{G}_j = \alpha_0 + \alpha_1 \cdot PDUMMY_j + \alpha_2 f(ASSIGNVAR_j) + X_j \kappa + \nu_j \quad (14)$$

$$\bar{Y}_j = \delta_0 + \delta_1 \cdot PDUMMY_j + \delta_2 f(ASSIGNVAR_j) + X_j \varphi + u_j \quad (15)$$

其中 $PDUMMY$ 是虚拟变量,当 j 县 1992 年的人均收入小于等于 400 元时取 1,否则取 0; $ASSIGNVAR$ 是断点回归的驱动变量,采用的是 j 县 1992 年的人均收入减去 400; $f(ASSIGNVAR_j)$ 是驱动变量及其与 $PDUMMY$ 交乘项的多项式函数。 α_1 和 δ_1 分别衡量扶贫政策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和人均 GDP 增长率的处置效应。

第二阶段回归的模型设定如下:

$$\bar{Y}_j = \beta_0 + \beta_1 \cdot \hat{G}_j + \beta_2 f(ASSIGNVAR_j) + X_j \Gamma + \varepsilon_j \quad (16)$$

其中, \hat{G}_j 为通过(14)式得到的 \bar{G}_j 的拟合值,(16)式估计得到的 β_1 即为财政扶贫政策绩效的衡量指标。

(三) 对断点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设定的说明

1994 年中国开始实施“八七扶贫计划”,采用“四进七出”划分标准重新确定了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所谓“四进七出”划分标准是指:1994 年之前不是贫困县的地地区,如果 1992 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400 元,一律划为新的贫困县;1994 年之前是国贫县的,如果 1992 年人均纯收入不超过 700 元,仍保留其贫困县资格。2001 年中国政府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纲要(2001-2010 年)》,并对贫困县名单进行了再次调整。但是这些调整并没有改变 1994 年贫困县的基本体系框架,被调出的县已经享受的政策维持不变,因此仍可以用 1994 年的贫困县资格划分这一制度断点研究“八七扶贫计划”结束以后的样本。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是 2000-2009 年,而人均纯收入 400 元的间断点是“八七扶贫计划”贫困县划分标准中界定的。之所以没有采用“八七扶贫计划”的政策实施期间(1994-2000 年),主要原因是该期间的县级 GDP 数据质量较差,而 2000 年之后各省的统计年鉴普遍公布了质量相对较高的县级 GDP 数据。另外该样本区间与 Guo 等(2016)等已有研究一致,便于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

为保证断点识别的有效性,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将样本进行了处理,使其严格符合确定型断点回归设计的要求。首先,不考虑“老贫困县”(即 1986 年贫困县名单中的

县)和“新贫困县”(即2001年新加入的贫困县)等不符合人均纯收入400元作为确定型政策间断点的样本;考虑到市辖区的财政体制与普通县市具有系统性的差异,在基准回归中也不考虑县级市、市辖区的样本。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再逐步加入了县级市、市辖区样本和2001年新加入国贫县名单的样本。在整个经验研究中,没有考虑与“八七扶贫计划”实施时“四进七出”划分标准不符合的样本。

五 经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是2000-2009年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各县的GDP、财政支出和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所有名义变量均调整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断点回归的核心变量即1992年县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农业部。另外,借鉴现有文献,将期初农业产值占比、期初农业人口占比、期初人均播种面积(反映自然禀赋)、期初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作为影响地方政府GDP增长的县级层面控制变量。县级农业产值、财政供养人口数等来自《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农业人口数、农作物播种面积等来自《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全样本			400元断点左侧的县			400元断点右侧的县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财政支出增长率	1195	0.2172	0.0375	135	0.2204	0.0400	1060	0.2168	0.0371
GDP增长率	1195	0.1273	0.0389	135	0.1233	0.0356	1060	0.1278	0.0393
农业产值占比	1162	0.4334	0.2237	134	0.5689	0.1990	1028	0.4157	0.2207
农业人口占比	1157	0.8188	0.1321	134	0.9048	0.0543	1023	0.8075	0.1351
人均播种面积	1177	48.40	115.46	134	35.87	22.25	1043	50.01	122.31
财政供养人口占比	1163	0.0320	0.0180	134	0.0331	0.0270	1029	0.0319	0.0165

说明:表中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指的是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下表同。

(二)断点回归的有效性检验

应用断点回归必须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个体不能精确地操控政策虚拟变

量,如果个体事先知道分组规则,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而完全控制分组变量,这将引起断点回归的失效。大量研究(毛捷等,2012; Meng, 2013; 刘畅和马光荣, 2015)已经证明“八七扶贫计划”中的400元断点处不存在个体操作驱动变量的问题。

应用断点回归的另一个要求是第一阶段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在驱动变量的间断点上是非连续的,回归分析中通常采用图示法来检验结果变量在临界值上是否存在跳跃。作图过程中通常按照驱动变量选择一定的带宽(bandwidth)构造箱体(bin),采用箱体內的样本均值和多项式拟合曲线来呈现样本的分布情况。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带宽的选择,如果带宽选择过小,箱体数目就会过多,图形就会表现的过于杂乱,也不能与拟合线很好的契合。如果带宽过大,就不能很好的呈现出箱体內样本所代表的信息,此外,将与间断点左右相邻的两个箱体的样本均值进行比较可以大致推断出处置效应大小,带宽过大会导致这样的比较产生严重偏误。

本文综合考虑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和 Calonico 等(2014)提出的数据导向型断点回归图的做法,以5元为带宽和二阶多项式拟合线来绘制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断点回归样本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的是1992年的人均纯收入,第一阶段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bar{G}_j)和人均GDP增长率(\bar{Y}_j)在间断点上是非连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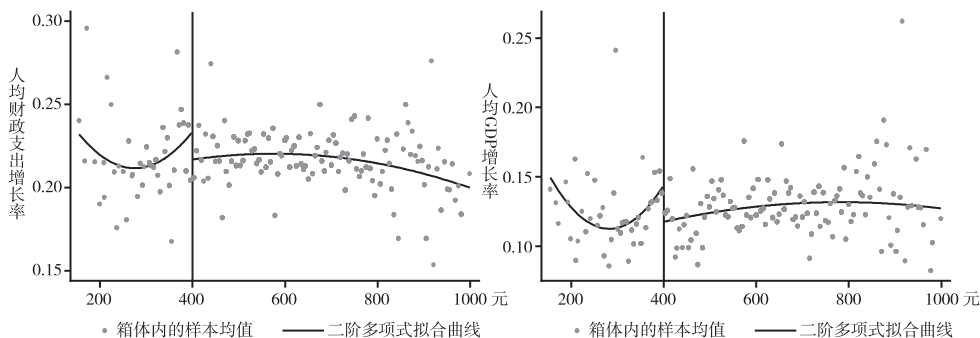


图1 间断点附近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分布

(三)回归结果

1. 基准回归结果。首先我们应用OLS回归方法对县级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评估,表2中的a部分报告了加入与不加入控制变量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不加入控制变量,第(2)列只加入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第(3)列加入省级和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表2的a部分说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增长率只增加0.29-0.33个百分点,说明财政支出的绩效是非常低的。前文已指出OLS

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可靠。

接着我们应用断点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中国的扶贫政策对贫困县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对中国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估。

表2的b、c部分(1)–(3)列是基于全部样本和3阶多项式的回归模型所得到的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相对于其他地区平均每年多增长1.49和2.25个百分点;加入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平均每年多增长1.63和2.48个百分点;加入县级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平均每年多增长1.81和2.42个百分点。c部分的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增长率上升1.34–1.52个百分点。

表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1)	(2)	(3)	(4)	(5)
a. OLS 回归						
GDP 增长率	财政支出 增长率	0.3304*** (0.0337)	0.2882*** (0.0333)	0.3084*** (0.0347)		
b. 第一阶段回归:断点回归						
财政支出 增长率	贫困县 虚拟变量	0.0149* (0.0086)	0.0163** (0.0072)	0.0181** (0.0072)	0.0252* (0.0129)	0.0207** (0.0087)
GDP 增长率	贫困县 虚拟变量	0.0225** (0.0093)	0.0248*** (0.0076)	0.0242*** (0.0077)	0.0275** (0.0134)	0.0258*** (0.0094)
c. 第二阶段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GDP 增长率	财政支出 增长率	1.5108** (0.6231)	1.5171*** (0.4633)	1.3407*** (0.4248)	1.0911** (0.5313)	1.2459*** (0.4546)
	多项式阶数	3	3	3	1	3
	带宽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50	±500
	省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943	943	905	90	811

说明: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值为估计量的标准误,下表同。

在基于全部样本和三阶多项式的两阶段回归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选择不同带宽、采用部分样本进行两阶段回归,结果列于表2中的(4)–(5)列。回归结果表明,在

± 50 元和 ± 500 元的带宽下,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 2.07-2.52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 2.58-2.75 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 增长率上升 1.09-1.25 个百分点。这些估计结果与表 2(1)-(3)列的结果较为接近,说明两阶段回归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采用简单 OLS 回归方法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的绩效非常低,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时增长率只上升了 0.29-0.33 个百分点,远低于采用断点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所得到的估计值,说明内生性使得财政支出的绩效被严重低估,断点回归是较为合理的估计方法。

2. 稳健性检验。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我们逐步加入了县级市、市辖区样本和 2001 年新加入国贫县名单的样本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见表 3。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加入县级市、市辖区			加入县级市、市辖区和新国贫县		
		(1)	(2)	(3)	(4)	(5)	(6)
a. 第一阶段回归:断点回归							
财政支出 增长率	贫困县	0.0182 **	0.0239 *	0.0181 **	0.0176 **	0.0234 *	0.0168 *
	虚拟变量	(0.0073)	(0.0132)	(0.0088)	(0.0074)	(0.0120)	(0.0086)
GDP 增长率	贫困县	0.0238 ***	0.0273 **	0.0256 ***	0.0253 ***	0.0284 **	0.0269 ***
	虚拟变量	(0.0076)	(0.0133)	(0.0094)	(0.0075)	(0.0121)	(0.0090)
b. 第二阶段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GDP 增长率	财政支出 增长率	1.3094 ***	1.1424 **	1.4163 ***	1.4357 ***	1.2145 **	1.5991 ***
		(0.4175)	(0.5560)	(0.5183)	(0.4271)	(0.5168)	(0.5358)
	多项式阶数	3	1	3	3	1	3
	带宽	全样本	± 50	± 500	全样本	± 50	± 500
	省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1084	91	927	1143	105	985

表 3 第(1)-(3)列表明,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县级市、市辖区的样本后,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 1.82-2.39 个百分点,人均 GDP 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 2.38-2.73 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 1 个百分点时人均 GDP 增长率上升 1.31-1.42 个百分点。表 3 第(4)-(6)列的结果表明,加入了县级市、市辖区样本和 2001 年新加入国贫县名单的样本后,扶贫政

策使得贫困县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1.68-2.34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相对于其他地区上升了约2.53-2.84个百分点,人均财政支出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增长率上升1.21-1.60个百分点。与表2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本文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旨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平衡布局的理论设想,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困问题的成因和财政扶贫政策的作用机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困问题首先是由于部分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所导致的贫困,贫困地区经济主体生产最终产品的个别价值要高于经济发达地区,其生产经营的利润率较低,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提高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是扶贫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另一方面,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下,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财政扶贫政策既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即形成贫困地区的生产性资本和公共资本,也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复杂度,使其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要衡量财政扶贫支出的绩效应重点考察与非贫困地区相比,财政扶贫是否使贫困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更快增长。因此在经验研究部分,我们以人均实际GDP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表变量,一方面衡量了财政扶贫支出增长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也衡量了财政扶贫支出的产出弹性。

经验研究中,本文利用“八七扶贫计划”国家级贫困县资格划分的准自然实验,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出扶贫政策带来的人均财政支出增长及其引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从而评估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研究发现,2000-2009年财政扶贫政策使得贫困县人均财政支出平均每年比其他地区多增长约1.81个百分点,而扶贫财政支出的增长又使贫困县的劳动生产率比地区平均每年多增长2.42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对贫困县的财政扶贫政策绩效是比较显著的。贫困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能够提高人均收入、创造更多产出,进而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两者之比1.34有两层经济含义,一是财政扶贫支出每增长1个百分点,贫困县的劳动生产率会增长1.34个百分点,二是财政扶贫支出的产出弹性为1.34。

本文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没有将贫困率、收入分配等作为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绩效评估的目标变量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在当前

“整村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未来的研究也可以细化到以村为单位来进行评估。

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进入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并明确指出了新时代下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从现在到2020年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贫困问题,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策制定,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因此,本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并基于该理论经验评估了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的绩效,研究结果对中国的“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应用财政政策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陈振明、吕志奎(2017):《〈摆脱贫困〉中的地方治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
- 李海明(2014):《一个古典—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中国经验》,《经济研究》第11期。
- 李晓红、周文(2009):《贫困与反贫困的产权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 李燕凌、欧阳万福(2011):《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 刘畅、马光荣(2015):《财政转移支付会产生“粘蝇纸效应”吗?——来自断点回归的新证据》,《经济学报》第1期。
- 刘建华、丁重扬(201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贫困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 刘树成、周思毅(1985):《生产函数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兼与王书瑶同志商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 骆桢(2016):《有机构成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条件及其背后的矛盾关系》,《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 毛捷、汪德华、白重恩(2012):《扶贫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基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4期。
- 王峰明(2016):《悖论性贫困:无产阶级贫困的实质与根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6期。
- 王艺明(2017):《经济增长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经济研究》第11期。
- 王艺明、刘志红(2016):《大型公共支出项目的政策效果评估——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例》,《财贸经济》第01期。
- 晏智杰(1982):《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效用分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杨春学、张琦(2014):《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动态》第9期。
- 张彬斌(2013):《新时期政策扶贫:目标选择和农民增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Barro, R. J. and Redlick, C. J. “Macroeconomic Effects from Government Purchases and Tax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1, pp. 51–102.
- Calonico, S.; Cattaneo, M. D. and Titiunik, R. “Robust Data-Driven Inference in the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

sign." *Stata Journal*, 2014, 4, pp. 909–946.

Foley, D. K. and Michl, T. R.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uo, Q.; Liu, C. and Ma, G. "How Large is the Local Fiscal Multiplier?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un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6, 2, pp. 343–352.

Hall, R. E. "By How Much Does GDP Rise if the Government Buys More Outpu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09, pp. 183–231.

Meng, L. "Evaluating China's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3, pp. 1–11.

Fiscal Anti-Poverty Theory and Policy from the Maxism Perspective: Exploration under the Spiri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Wang Yiming; Hu Jiukai

Abstrac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maintains tha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lready crossed the threshold of a "new era", 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that reveal deficiencies with respect to public welfa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remains a formidable task for the country. For this reason, the period between now and 2020 will be decisive in comple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economics with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text, this paper develops the anti-poverty theory of Marxism. We construct a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model based o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nd fi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iscal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that benefits poor areas promotes the growth of overall economic consumption and reduces the gap between regions, without slowing down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rate. Based on theoretical studies, we provide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and note that the impact of this is noticeable in poverty-stricken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is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nd how fiscal policy can be used to achiev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fiscal spending performance, Marxist theory,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TV)

JEL codes: D31, H77, H50

(截稿:2018年2月 责任编辑:曹永福 李元玉)